



通过了
《蒙古青年建国会章程》

他本扎兰蒙古族青年大会是由阜新县政府召开的会议，是在阜新地、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召开。阜新地委组织部长施介、阜新县长刘哲生、阜新县副县长叶舟三位同志全程参加了会议。

“施介同志是党从延安派来的一位彝族干部，他给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与我们研究问题时是商量的口气。他的作风艰苦朴素，穿一身灰布棉军装，脚上穿一双土布面蛤蟆鞋，与我们同吃同住。他的作风令人敬佩，使我们从思想感情上向党接近了，向革命靠拢了。”白遇阳讲，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包括：教育工作者，如包忠爱、达木林、白遇阳，这几个人都在本地区当过教师，在蒙古族青年中有一定影响；还有阿勒塔、季凤林等几个人，最先同地委、县委领导接触，并做了会议的准备工作；青年学生中有大学生吴永瑞等；此外，还有开明人士董恩可等人。

这次大会的会期两天，头一天在套吐营子开了预备会，在施介同志和刘哲生同志主持下，研究会议的开法和建立阜新蒙古青年建国会的问题。第二天在他本扎兰兴农村小学召开了大会，大会由刘哲生同志主持。包忠爱同志代表蒙古族青年讲话。他的讲话主要阐明阜新地区蒙古族的地位及其历史沿革，明确表示蒙古族青年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拥护共产党解放少数民族的主张，要求民族自治，成立旗政府。

施介同志在大会讲话中提出，阜新是蒙古族聚居的地区，我们党历来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领导少数民族走民族解放的道路，并支持你们提出民族自治的要求。他肯定了蒙古族青年的革命热情，并指出更需要懂得革命道理和学会怎么干革命，因此要成立阜新蒙古青年建国会组织。

“经过预备、酝酿，大会通过了《蒙古青年建国会章程》，是预备会上在施介亲自指导下，由我起草的章程。蒙古青年建国会的性质：是党领导下的蒙古族进步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阜新农村根据地和民族解放事业。”白遇阳介绍，会议通过了蒙古青年建国会委员名单，委员有包忠爱、达木林、白遇阳、季凤林、阿勒塔、吴永瑞、车德日等11人。蒙古青年建国会建立后，还未来得及开展工作，阜新地委和阜新县政府就撤退到旧庙、平安地一带了。

指引蒙古族青年
走上革命道路

1946年1月，阜新县委接到哲里木盟地委的通知，要求阜新县派5名蒙古族青年代表参加1月15日召开的东蒙人民代表大会。阜新县委同意派代表参加会议，积极支持阜新蒙古族青年参加民族自治运动。会上选举包忠爱、王宝山、车德日等人为代表出席在葛根庙（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召开的东蒙人民代表大会。

“他本扎兰蒙古族青年大会，号召蒙古族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民族民主革命。阜新地区广大蒙古族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奔赴游击根据地——平安地，参加革命斗争。1946年3月成立的阜新县土默特左旗联合政府以及著名的阜新蒙民大队，其主要干部和骨干力量都是参加了他本扎兰蒙古族青年大会的蒙古族青年。”白遇阳讲，“这次大会是我党在阜新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蒙古族知识青年投身于阜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动员大会。这次大会在阜新蒙古族知识青年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它像革命的航灯，指引蒙古族知识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阜新蒙古青年建国会成立不久，我地方政府就北撤了，尚未来得及开展工作。北撤后，阜新地委、县委对阜新地区民族工作更加重视，以阜新县土默特左旗联合政府的形式代替了阜新蒙古青年建国会的工作。

于喇嘛寺的由来

□柳绍才 本报记者 李丹

在阜新大地上，有很多关于山、地名及风俗的传说和故事，这些传说、故事散落在民间，广为流传。本报记者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传说故事一一讲给读者听——

在阜蒙县西北方向有个镇名叫于喇嘛寺镇（简称于寺镇），它的名称由来与当地的一座寺庙有关。

相传在清朝年间，康熙皇帝微服私访时，曾来到聚宝峰下的一座旧庙前，时间已是日近正午了。康熙皇帝和随行两位大臣因为长时间的旅途劳累，腹中饥肠辘辘，便在庙前一棵大松树下乘凉歇息。他一边欣赏着周边的山川景色，一边心里想着：这庙宇虽然破旧，周围环境却非常幽静，山中林木茂密，山下溪水潺潺。康熙皇帝看着看着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有些困意，于是便席地而卧在树下睡着了。两位大臣互相对视一下，就坐在皇上身边陪着。

约摸过了一个时辰，有位喇嘛走出庙门，见松树下有三位俗人在纳凉。瞅瞅太阳，日已西斜，令他惊奇的是，树荫仍停在那个躺着的人身上。喇嘛感到很奇怪：都这个时候了，树荫应在东方，可现在树荫仍在偏北方。喇嘛猜测，这个人肯定是个大命之人，不是凡夫俗子。但又不知此人什么来路，便转身回到庙里为这三位过路人准备斋饭。

直到康熙皇上一觉醒来，这位喇嘛才将他们请到庙内用斋饭，边伺候着边与他们三人聊起来。喇嘛问道：“三位施主，不知是从何处而来，又到何处而去？”

康熙回答说：“我们从土默特右旗来，去土默特左旗。”

康熙环视一下庙宅内外，问道：“大师，这寺庙有几位喇嘛？你姓什么、名叫什么？”

喇嘛说：“我姓于，人们都叫我于喇嘛，庙内只有我们师徒二人。”

康熙思索片刻，对喇嘛说：“这寺庙就叫于喇嘛寺吧。”

他巡视一遍这又破又旧的寺庙，便拿出文房四宝，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给于喇嘛，说：“你去京城龙泉寺学法时带着这封信，找一位叫陶克图的大喇嘛，不见到他本人，这封信一定不能露出来。”

于喇嘛双手接过这封信，更加热情地招待这三位过路人。

康熙君臣吃罢斋饭后就上路了。

不久，于喇嘛就前往京城龙泉寺学法。他几经周折，多方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位陶克图大喇嘛所在的寺院，将信面交于他。

陶克图大喇嘛接过书信看了看，才知道是当今圣上的手谕，也未露声色，便吩咐小喇嘛好生招待于喇嘛，并为他安排食宿和佛书经卷，留下来学法。

转眼间，两个多月过去了。于喇嘛心想，自己也该回去了，但却不知大喇嘛陶克图看了那封信后为何没有答复他，便找了个机会想将书信的事问个明白。

陶克图大喇嘛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好啦，好啦，你也该回去了。”其他的，就再也没有多说什么了。

于喇嘛也没敢多问，心里想，这个大喇嘛真是糟糕。他闷闷不乐，很生气地离开龙泉寺，告别了京城，踏上了归途。

那年月，喇嘛出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靠步行，这一来一回就是半年多。于喇嘛回到寺庙一看，他愕然了，原来破旧不堪的寺庙不见了，一座全新的大雄宝殿拔地而起，寺庙的一切附属建筑全部落成。徒弟哈力嘎将于喇嘛接进寺庙内，告诉他说：师父您走后不久，就有人带来一百多个工匠，日夜不停，大兴土木建成了这座寺院。从此，于喇嘛寺便在当地叫响了。

后来，于喇嘛寺又更名为佑安寺。据说，佑安寺的牌匾还是康熙皇上亲笔所赐的呢！后来由于寺庙大，喇嘛多达上百人，香客络绎不绝乐声不断，方圆百里的善男信女都前来进香，整个寺院既庄严又静谧。所以，附近村屯久而久之便由庙名而为村名、镇名了，直到如今。

“1945年11月的一天，我们一群蒙古族青年到他本扎兰参加了蒙古族青年大会，原计划几十人的大会一下子来了二百多人。从那次大会之后，我们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就开始发生巨大转变……这次大会，在蒙古民族解放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市政协原副主席白遇阳

“九·三”胜利不久，我党收复了阜新。1945年11月下旬，阜新县委、县政府在阜新地委的领导下，在他本扎兰（今阜蒙县阜新镇）兴农村小学召开了著名的阜新蒙古族青年大会。白遇阳（1919年生，阜蒙县蜘蛛山乡人，曾任中共阜新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政协阜新市第三、四、五届副主席，1983年离休。）就是参加这次大会的蒙古族青年之一。

会议前一天
应邀者全部到齐

阜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阜新县（今阜蒙县）政府成立后，工作中尤其注意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和调动蒙古族知识青年的积极性。阜新地委和阜新县委的领导同志普遍了解蒙古族知识青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热爱本民族，要求民族解放，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地委、县委的领导同志认为，这批蒙古族知识青年是我党在阜新开展工作的基本力量。以更好地团结他们，发动他们参军投入革命斗争为目的，召开了这次大会。

召开蒙古族青年大会的筹备工作，是由阜新县政府发起的。在副县长叶舟同志领导下，住阜新新城的包忠爱、阿勒塔、王宝海等人做了具体的筹备工作。第一件事是拟写会议《通知》，将《通知》发给所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人员。内容是向蒙古族青年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号召他们积极参加会议，共商民族解放大事及会议地点和日期等；第二件事是邀请少数开明人士参加会议；第三件事是会议的地点，原来通知到阜新县政府报到，但接近报到日期时，因县城里被主力部队和干部住满，所以临时改在他本扎兰兴农村小学召开。与会人员的食宿全部安排在他本扎兰的西临套吐营子。会议的前一天，应邀者全部到齐，说明会议的召开不仅有号召力，而且深得人心。

□本报记者 刘丹 摄影报道

蒙古族青年心中的革命种子

